

專輯論文

情之殤：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

楊國斌

摘要

2013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網絡文化與政治發生了新變化。以抗爭為主要特色的網絡事件有所減少，以共識性為特點的新媒體事件有所增加。這一轉型的直接原因，是網絡事件的情感動員受挫。網絡動員中的主導情感，如悲情、戲謔、憤怒等，皆被冠之以負面情感、非理性、煽情、不文明等標籤，予以打擊和壓制。抑制情感動員的主要因素，是網絡管制上「文明淨網」的新舉措及其實施的社會環境。這個「文明淨網」的過程，可稱之為「文明的進程」。「文明的進程」，使洶湧的網絡情感受阻，導致中國互聯網的情之殤。

關鍵詞：情感動員、文明、網絡事件、新媒體事件、網絡審查

楊國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南伯格傳播學院與社會學系教授。研究興趣：批判社會學理論、社會運動理論、全球傳播、新媒體社會學、文化社會學。電郵：guobin.yang@asc.upenn.edu

論文投稿日期：2016年3月2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6年11月30日。

Special Issue Article

Killing Emotions Softly: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f Onlin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Guobin YANG

Abstract

Since 2013, contention-oriented Internet ev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transformed into consensus-oriented new media events in the Chinese cyberspace. The direct caus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the obstruction of onlin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he main emotions expressed in online mobilization, such as sympathy, anger, and playfulnes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labeled and attacked as negative, irrational, and uncivil. The key condition surrounding the demobilization of online emotions is a set of new policies that are centered on the concepts of civility and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new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se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The practice of regulating the Internet in the name of civility constitutes a civilizing process. This process has undermine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online, leading to the weakening of contentious online activism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years.

Keywords: emotional mobilization, civility, Internet event, new media event, Internet censorship

Guobin YANG (Professor).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esearch interest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social movements, glob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media sociology, cultural sociology.

Killing Emotions Softly: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f Onlin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Yang, G. (2017). Killing emotions softly: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f onlin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 75–104.

致謝

感謝邱林川教授和陳韜文教授邀請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的兩屆「新媒體事件」研究工作坊。感謝所有參加工作坊的學者提供的寶貴意見。苗偉山博士及兩位匿名審稿人對此文亦提出寶貴修改意見，一併致謝。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網絡行動主義 (online activism) 自九十年代中後期發端，在二十年間發生了很多變化。其中變化較大的一個時期，是2013年至今。2013年之前，網絡事件基本呈持續增長的態勢。但是2013年以來，重大網絡事件、尤其是具有抗爭性的網絡事件，有所減少，批評和抗議的聲音受到削弱。同時，網絡輿論趨於分化，反動員的聲音和支持政府的「正能量」明顯加強，共識性新媒體事件有所增加。

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較為複雜，但直接原因，是網絡動員的情感邏輯受挫。網絡動員中的主導情感，如悲情、戲謔、憤怒、怨恨等，往往被冠以負面情感、非理性、煽情、不文明等標籤，予以打擊和壓制。抑制情感動員發生作用的主要因素，則是政府網絡管制上的新舉措及其實施的社會環境。網絡管制方面的新特徵，表現在意識形態控制和文化宣傳策略的強化。這其中核心的內容，又可稱之為「文明淨網」。「文明淨網」的過程，可借用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 (Elias, 1939/2000) 的概念，稱之為「文明的進程」。

「文明淨網」的核心，是「文明」話語在網絡管制和審查中的作用。其運作分兩個層面。一方面，「文明」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話語，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新的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意識形態的文明，英文可譯為 *civilization*。另一方面，「文明」則以社會規訓技術 (*technologies of social control*) 的形式 (Herbst, 2010)，見諸於網絡以及城市和鄉村的公共空間，成為規範日常行為的準則。這一層面的文明，英文可譯為 *civility*。作為規訓技術的文明，從作為意識形態的文明話語型構 (*discursive formation*) 中獲取合法性。

「文明的進程」使洶湧的網絡情感表達受阻，導致中國互聯網的抗議性情感表達的衰弱。這是網絡情感表達之殤。抗爭性網絡事件的減少和共識性新媒體事件的增加，¹ 構成中國大陸網絡空間的結構性轉變。這一轉變過程，與哈貝馬斯所分析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有相似之處。

本文借用「新審查理論」研究中國大陸的網絡審查，並以此來分析網絡審查如何以「文明」的方式，消解情感在網絡動員中的作用。這裏需要強調說明，本文的出發點不是反對網上的文明行為，而是闡述文

明的話語如何成為國家治理術。作為國家治理術的文明話語，是現代國家和社會制度發展中常見的特徵(Elias, 1939/2000)，並不限於中國大陸，也不限於對互聯網的治理。

網絡事件的新變化

2009年《傳播與社會學刊》發表「新媒體事件」專輯。由於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方始運營，專輯中的論文未涉及微博。因此，這裏有必要以新浪微博的出現為節點，簡要回顧網絡事件的變化。新浪微博的成功推廣，給網絡事件提供了新平台，推動了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影響。在新浪網推出微博之後的2010–2012的三年間，網絡事件達到高潮，事件發生的平台從網絡論壇和社區向微博轉移。這期間比較有影響的事件大多以微博為主要平台。重要的事件包括2010年的「我爸是李剛」和錢雲會事件，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和溫州動車事件，2012年的楊達才「表哥」事件、雷政富事件，2013年的湖南臨武瓜農之死事件等等。

海內外學者對網絡事件或新媒體事件從概念、理論和實證諸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吳世文，2014；隋岩、苗偉山，2014)。情感動員在公共事件生成中的作用引起諸多關注(楊國斌，2009；卞清、高波，2012；焦德武，2014；劉濤，2016；袁光鋒，2016)。除悲情與戲謔之外，有學者提出了對網絡動員有重要影響的其他幾種情感，如怨恨(王謙秋，2013)和憤怒(謝金林，2012)。也有學者研究了謠言在情感動員中的作用(郭小安，2013)。同時，對網絡情感的研究，也為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的情感結構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視角(楊國斌，2013；Szablewicz, 2014；劉濤，2016)。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3年微博用戶規模明顯下降，從2012年的3.09億人，減少到2.81億。與微博用戶的下降相呼應，網絡事件有所減少。上海交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發布的輿情報告顯示，2012–2014年，正面輿情事件比重明顯增多，負面輿情事件比例下降(上海交通大學，201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所謂負面輿情事件，一般帶有抗爭和批判的性質，符合本文研究的網絡事件範疇。人民網發布的2013年互聯網輿情報告則稱：「經過幾個月的清理，網上爆料社會負面現象特別是批評政府的聲音明顯減少，帖文情感詞力度下降，積極正面的聲音日漸增多。」(人民網，2014年3月18日)

由此可見，2013年是網絡事件歷史上值得注意的轉折點，網絡事件在頻率和內容上開始發生重要變化。對變化的原因，人民網的輿情報告有如下分析：

2013年，網絡輿論板塊發生重要變化。政府加大了對互聯網的管理力度，微博大V遭遇沉重打擊，加上微信的分流，微博熱度大幅度下降。微信用戶增長迅速，新聞客戶端也在發展中，移動互聯網開始成為社會輿論的新信源。在突發事件中，政務微博發聲成為政府新聞發布的「標配」，中央級媒體和各級黨報紛紛開設法人微博，經常成為事態演變的重要變量。(人民網，2014年3月18日)

報告還稱：

2013年8月以來的打擊網絡謠言，警方抓捕違法「大V」，急風暴雨的運動式治理，對全社會產生震撼，似乎政府對互聯網的態度以打壓為主。其實近年來互聯網治理已經形成一整套較為完整的剛柔並濟的思路，有如下4個重要節點。2011年10月13日，國信辦召開「積極運用微博客服社會經驗交流會」，鼓勵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開設微博客、用好微博客。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夜，《人民日報》開通法人微博，現已成為第一大媒體微博，帶動一大批體制內媒體前進到微博輿論場域，積極引導輿論。2013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體現了網民自律和網絡社區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2013年9月9日，「兩高」出台〈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標誌著對網絡消極現象從被動應對變成主動依法治理。(人民網，2014年3月18日)

人民網的報告，說明在互聯網治理模式上，「柔性治理」、「剛柔並濟」是近年高調宣稱的新思路。本文認為，這其中的柔性治理，實質上是自鄧小平以來，「文明」話語的意識形態化的引申和發展。因此，我們有必要將文明治網的實踐，置於「文明」話語的歷史背景中來分析和理解。在分析之前，有必要簡單梳理關於互聯網審查的理論模式。

網絡審查的混合模式

對言論審查的研究，在理論上有三個來源。一是西方經典的自由主義觀點。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言論自由的絕對價值。言論審查限制言論，自然受到批判。自由主義觀點認為，言論審查具有外在性、強制性和鎮壓性等三個特點 (Bunn, 2015)。也就是說，對言論表達的審查，是政府以強制性的措施予以干涉，或預防，或事後進行處置。很多關於中國大陸互聯網審查的研究背後的審查觀 (King, Pan, & Roberts, 2013; MacKinnon, 2008; Tsui, 2003)，基本屬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

第二種關於言論審查的理論，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國家與公民社會理論的批判。馬克思本人在青年時代做過記者和報刊編輯，曾經在他寫的報刊專欄裏闡述新聞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寫到：「新聞出版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轉引自 Hardt, 2000, p. 89)。但是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中，言論管制不過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手段，但相比意識形態而言，則屬較低級的手段。真正有效的統治方法，是通過意識形態的作用，不動聲色、潛移默化地規制人的思想和言行，從而形成葛蘭西式的霸權 (hegemony)。而只有在意識形態效果不佳的情況下，才需要動用壓制性的言論審查手段。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為「新審查理論」提供了借鑒 (Bunn, 2015)。

所謂「新審查理論」，主要是針對傳統的自由主義審查理論而言。新審查理論的概念，在2004年即有學者提出並有所闡述 (Muller, 2004)，但是互聯網的發展及網絡審查和監控的現實，給「新審查理論」賦予了新的意義。這表現在三方面。首先，根據新審查理論，審查的性質並不一定都是壓制性的，審查的實質也不一定限於對言論的禁錮。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反，審查的過程也能生產出新的話語，促使新話語形態的產生。從這個角度看，審查可能具有特殊的言論產出能力(productive) (Chen, 2015)。第二，新審查理論認為，審查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和政府，也包括公民社會和其他個人或組織的參與。第三，新審查理論認為言論審查無處不在，沒有純粹的自由交流和傳播。以上特點表明，新審查理論深受福柯的權力理論影響，同時也受到布迪厄的語言和象徵權力理論的影響。布迪厄認為，最有效的審查是看不見的、習以為常的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的習慣是在社會和文化結構規制的條件下，逐漸形成的(Bourdieu, 1991)。在關於大陸互聯網審查的研究中，近年來有不少學者的研究(Chen, 2015; Han, 2015; Taneja & Wu, 2014; Yang, 2014)，超越了傳統的自由主義審查觀，展現了網絡審查更為微妙和複雜的圖景，在理論根源上與「新審查理論」不謀而合。

作為意識形態的「文明」話語

「新審查理論」對分析中國的網絡治理有何借鑒意義？上文提到的官方話語中的「剛柔相濟」的網絡治理思路，其中剛的一面，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所批判的來自國家對言論的粗暴干涉。而柔的一面，則對應了「新審查理論」關於審查主體和審查效果的基本觀點。柔性治理包括政府以外的行動主體，如網絡公司、互聯網協會、網評員、「自乾五」、普通網民等等。柔性治理的手段和策略，不限於強制性的規定和法律，還包括主流媒體佔領網絡陣地，爭奪話語權等「積極」手段。

實際上，剛柔相濟的治理策略，古已有之。遠可追儒家的教化傳統，近則見諸孫中山的「教化型國家」的政治理念(Cheek, 2016, p. 107)以及毛的黨內鬥爭策略(Perry, 2013; Thornton, 2007)。歷史學家高華在對1942年延安整風的研究中指出，「毛澤東領導的整風並不單純依賴暴力鎮壓，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於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高華，2000：393)。以「文明」為核心的官方話語和意識形態，與「教化」的治理手段可謂一脈相承。

「文明」的話語同樣由來已久，且一向與國家、權力、暴力、殖民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Duara, 2001; Gong, 1984)。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

斯在其經典著作《文明的進程》一書中，分析了近現代的歐洲社會何以認為自己比別人更文明的問題，進而揭示了「文明」話語在現代國家的形成、國家暴力、社會制度、乃至個人意識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埃利亞斯指出，「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包羅了多種多樣的現象：「可以指技術水平、行為舉止、科學知識的發展、宗教觀念與習俗。也可以指住宅的樣式、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法律懲罰的形式、甚至是做飯的方法。嚴格來說，幾乎沒有什麼不能夠用『文明』或『不文明』兩個詞所涵蓋的。」(Elias, 1939/2000, p. 5)

「文明」在近現代國家與社會發展歷史上的重要性在於，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主張社會改革的啟蒙主義者開始意識到，宮廷、皇室和帝王對於社會，不可能做到絕對有效的控制。因為在統治階層之外，有強大的社會力量可以影響國家政治。在這樣的啟蒙思想影響下，「文明」逐漸成為一套社會規制的話語體系。埃利亞斯通過對人的日常舉止(manners)在西方社會演進的研究，揭示了這個話語體系發展的漫長道路。他發現：現代性作為向「文明」發展的過程，既是現代社會國家和國家制度發展的過程，也是人的自我管理發展的過程(Elias, 1939/2000)。舉止的文明化(civilizing)，是從強制性的外部統治向自覺的個人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演進的過程。

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文明」的話語與現代化的價值觀和行為緊密聯繫在一起(Anagnost, 1997; Duara, 2001; Festa, 2006; Friedman, 2004; Litzinger, 2000)。文明代表先進、受過良好教育、有文化、有素質、「洋」。與文明相對立的是落後、封建、沒文化，素質差。這套文明話語與中國歷史上重文化的儒教傳統一脈相承，因此即使在最反文化的「文革」期間，人們對文化和知識仍然保持著不自覺的崇拜。紅衛兵小報和大字報上的文章充滿語言暴力，但卻仍然講究書法、文采、修辭，追求排山倒海之勢的排比和對比的句法。另一方面，正如劉禾(Liu, 1995, p. 240)在論及中國現代性與「文化」的話語時所言，與「文明」話語緊密相關的「文化」概念，產生於「中西方相遭遇的近代歷史。正是這種遭遇，把種族、進化、文明、和國家認同等問題擺到了國內知識分子的眼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後毛時代的文明話語，始於鄧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鄧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1994：208)在1980年的另一個講話中，鄧小平說：「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係，等等。」(鄧小平，1994：367)

鄧時代的文明話語，以強調社會全面發展的方式，淡化了毛時代的階級鬥爭話語，從而為從階級鬥爭向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轉型提供了合法性(Anagnost, 1997)。鄧小平提出的「精神文明」，核心是社會主義法治，同時也強調道德、紀律、信念等。從這一點來看，當前剛柔相濟的文明治網，其理論基礎正是兼及法治和德治的「精神文明」的意識形態。到江澤民擔任國家領導人時期，文明話語向制度化發展。200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報告中，江澤民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設。2004年，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寫入憲法，成為第三個文明。政治文明突出了法治(江澤民，2006：200)。胡錦濤執政期間，又增加了「社會文明」。有學者認為，後毛時期從鄧小平到胡錦濤，對於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話語的宣傳和普及，說明「在中國意識形態的地貌上，文明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概念」(Dynon, 2008, p. 109)。這不僅表現在官方的政策和話語中，而且在制度上有所體現。最重要的制度表現，是在江澤民時期中央文明辦的成立。

「文明」的話語形構，對於普通公民有何要求？根據安葛絲(Anagnost, 1997)的觀點，八十年代的文明話語，突出的是「缺」(lack)，意思是中國社會缺少文明，公民素質差，因此需要提高素質，建設文明。這種突出「缺」的話語，到九十年代以後，有所變化(Festa, 2006)。九十年

代的文明話語，開始突出「自律」(self-discipline)。自律的話語，敦促人們根據文明的規範來加強修養，管理自己的行為。在這樣的話語空間，「不文明」、「沒素質」成為國家管理和規範公民行為的標籤。生活在城市裏的農民工及子弟，常常會被貼上這類標籤，受到歧視(Han, 2010; Kipnis, 2006)。

近年，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策略，特點是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表現在網絡治理上，即上文提到的剛柔相濟的策略。柔的表現，則是文明淨網，強調公民上網行為要文明、自律、守法。既然互聯網管理有法可依，何必還要訴諸文明話語？道理跟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文明」話語的發展頗有異曲同工之趣。沒有哪一個社會，能完全用法律來管理和統治。法律之外，道德規範具有重要作用，這在法治傳統偏弱的中國社會尤其如此(Bakken, 2000)。互聯網空間的治理，原本就跟不上技術和社會的發展，自身又具有很多新的特色(如匿名)，對治理提出新的挑戰。同時，現行的互聯網規定和法律所禁止的內容，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很多網上行為難以在法律條文內予以裁決。要減少這類「有害信息」，通過宣傳、監督、社會參與，以道德、「文明」為規範，成為新的策略。從治理者角度看，這些方法和策略的目的是發動群眾，互相監督、自我管理。這正是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話語的功能所在。

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話語

中國網絡治理的歷史，堪稱是一部網絡「文明」史。對於網絡言論的審查，一向以道德、文明、和諧為口號。但是，「文明」的進程頗為緩慢，效果並不明顯，網絡事件並未受到抑制。比如2009年，中國大陸曾經大張旗鼓地打著文明的旗幟，進行了一次全國性反低俗專項行動，但效果適得其反，不僅反低俗的效率甚微，反而被低俗戲謔了一場，導致「草泥馬」等一批網絡熱詞在網上廣為流傳(Tang & Yang, 2011)。但2013年以來，「文明的進程」有所加速，範圍明顯擴大。

如果網絡事件的動員受情感邏輯的支配，那麼，國家對於網絡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件的治理，必將力圖對其情感力量予以消解。近年網絡治理的新發展，佐證了這種以消解網絡情感來應對網絡事件的策略。國家是怎樣運用文明的手段，來消解推動網絡動員的情感因素的呢？或者說，國家對網絡的治理和規制，是怎樣以規制網絡情感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呢？

「文明」作為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的運用，本文稱之為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社會規訓技術」是福柯 (Foucault, 1998) 所說的「權力技術」(technologies of power) 與「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的結合。「權力技術」講的是國家權力的作用，「自我技術」強調公民個體自願接受權力的約束，自覺地對自我進行管理、調整、改善、和塑造。在現實生活中，「權力技術」與「自我技術」往往相互滲透，不易區分。這種兩者混雜的狀態，我們稱之為「社會規訓技術」。

「文明治網」的社會規訓技術，力圖重新構造社會的情感結構，是反情感動員的重要策略。情感管理，作為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實踐經驗，由來已久 (Perry, 2002)，而在經濟改革時期，也早已見諸各行各業 (如酒店服務、航空服務等等) (Otis, 2011)，包括線下抗爭的反動員 (Deng & O'Brien, 2013)。但是新媒體條件下的情感治理，囊括了一系列新話語 (如正能量、負能量、中國夢、網絡輿情、網絡安全、文化安全)、新策略 (如輿情的收集、分類、分析、培訓)、新手段 (如大數據的運用) 和新的行動者 (如輿情監測中心、智庫、商業公司) 等等。正是這整套的詞匯和概念，使「文明」具備了話語型構 (discursive formation) 的特徵。

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在網絡審查及情感反動員方面的具體表現，有諸多方面。本文根據對中國大陸媒體報道和網站內容的觀察和分析，歸納為以下八種：

1. 運動式治理
2. 官方媒體佔領網絡
3. 統戰新媒體
4. 法律
5. 社會力量

6. 「自乾五」、「理中客」、「小粉紅」

7. 網絡輿情分析產業

8. 國家文化安全

八種規訓技術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公民、媒體等行為，交叉融合，雖然動機有所不同（如輿情產業的主要動機是盈利），但都普遍使用文明的話語，以文明的名義治理網絡。

運動式治理，是中國大陸政治過程中的常見方式，毛時代運用最多，但改革以來亦時常運用（Cell, 1977; Perry, 2011）。在互聯網治理中，運動或專項行動，也是常見的手段（曹龍虎，2013），但運動的形式比毛時代更加多樣化，方法和手段更趨「文明」。以運動的形式，推動網民文明上網，曾在2006年做過。2009年的反低俗專項治理，更是以文明的名義，對網絡內容進行大面積治理，關停大量網站。2010年，中共中央外宣辦、文明辦發起過「文明上網、共建和諧」的網上徵文活動。以網上徵文的形式，邀請公民自願參加到製造文明話語的行列，是權力技術與自我技術的絕妙結合。近年的趨勢，一是在以往文明上網運動的基礎上，增加了類似文革中革命大批判的形式。批判的對象則是新型的微博大V，如薛蠻子、李開復等。其結果，借用《南方周末》2013年9月12日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導致「大V近黃昏」（范承剛、周華蕾、劉志毅、張瑞，2013年9月12日）。二是其他多種形式的應用，如以「掃黃打非」為主的專項行動命名為「秋風2014」專項行動、「護苗2016」專項行動等。即使在語言風格上，「秋風」、「護苗」這類專項行動，也都體現了文明話語的特徵。

對新媒體的「統戰」，是中共統一戰線策略在新媒體時代的創新。大陸政府對新媒體業界一直通過直接下指示、公開動員簽署企業自律等方式，要求業界加強對所經營網站的管控。如2014年，29家網站聯合簽署〈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將審查的視角深入到向來不受注意的新聞跟帖。新浪微博作為網絡事件的高發平台，其社區管理不斷加強，設立了舉報處理大廳、社區管理規定等細則，對「一些不和諧不文明的言論」加強審查。對新媒體人士加以「統戰」，是2015年5月18-20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新提法。原話是，「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加強和改善對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據中國中央統戰部的解讀，「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大致分兩類：一類是新媒體平台的經營者，一般可稱為新媒體從業人員；另一類是新媒體上內容的製造者，可籠統地稱為網絡意見人士。」(騰訊網，2015年6月4日)2016年，中共統戰部成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是對新媒體人士進行統戰工作的制度化步驟。將新媒體人士納入統戰範圍，一方面說明新媒體的影響力之大，另一方面說明官方在策略上，比以往更注重收編(而不是僅僅打擊)新媒體中有影響的人士。這與文明治網的策略也保持了一致性。

加強對法律手段的運用，從人民網2014年輿情報告的表述可見一斑。該報告對2013年的輿情進行分析，指出「2013年8月以來的打擊網絡謠言，警方抓捕違法『大V』，急風暴雨的運動式治理，對全社會產生震撼。」報告特別提出互聯網治理的四個重要節點，其中兩個是：(1)2013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體現了網民自律和網絡社區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2)2013年9月9日，「兩高」出台〈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標誌著對網絡消極現象從被動應對變成主動依法治理，說明柔性的文明治理技術背後，同時有國家機器支撐(人民網，2014)。

依靠動員社會力量來淨化網絡，表現在社區、居委會、地方網絡文化協會、共青團等參與網絡文明監督。社區治理一直是大陸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Tomba, 2014)，為「文明治網」提供了基層治理經驗。如共青團中央關於廣泛組建網絡文明志願者隊伍的計劃，要求全國基層團組織建設網絡文明志願者隊伍，參加人數不少於團員總數的20%。隊伍建設對網絡文明志願者的主要責任有詳細描述，如「在互聯網上主動弘揚正能量」，「自覺增強網絡文明素養。遵守互聯網法律法規和網絡文明規範，自覺依法上網、文明上網、綠色上網，不瀏覽不健康的網絡頁面和信息，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團中央關於廣泛組建網絡文明志願者隊伍的通知，2015)。評選文明家庭、文明社區、文明村莊、城市等待是社區治理中一種常見方式。用到網絡治理，則是盛行於全國各地的文明網站的評選活動。網上搜索資料發現的案例，包括

宜興市文明辦2015年8月發給「各鎮人民政府，環科園、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市各街道辦事處，市各委辦局，市各直屬單位」的文明網站評選通知。通知所附「文明網站測評標準」對打分標準有明確規定，如「唱響主旋律，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傳播正能量」得6分，「堅持『七條底線』，建設清朗網站空間」得6分、「組織網絡文明志願者積極開展文明公益活動，傳播文明、引領風尚」得4分等等，滿分為100（宜興市文明辦，2015）。

「自乾五」、「理中客」、「小粉紅」等新型網民標籤的出現，說明「文明淨網」的政府策略，在網民中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受到部分網民的支持。「自乾五」者，指「自帶乾糧的五毛」，即志願網評員。「理中客」指在網絡討論中以「理性、中立、客觀」自居者。「小粉紅」則是因為參與2016年1月20日的「帝吧出征」事件，而被《人民日報》微博公號歡呼為「已經登上歷史舞台的」、「充滿陽光和自信的」90後愛國青年（人民日報，2016年1月22日）。這三類網絡群體中，有愛國者，有民族主義者，有體制的支持者。但她們中間也有很多網遊玩家、「愛豆」粉絲等等。這類網民的出現，與大的社會背景有關係。網絡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左翼思潮的復興，部分網民對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負面新聞報道的反感，甚至紅色文化的再度主流化等等，都會影響到網民對網絡輿論和政府治理網絡空間的態度。

日益產業化的網絡輿情分析，為文明治網提供了一套新的語言和方法。其突出特點，是把網絡言論用各類指標加以區分，如情緒指數、理性指數、正能量指數、理性度、悲觀度、冷漠度、希望度等等。分類與指標，是國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其目的是通過信息處理，加強對社會趨勢的瞭解，便於掌控（Scott, 1999）。就網絡輿情分析而言，問題在於當政府部門用這類指標去衡量和審查網絡話語的時候，是否也分析研究產生正、負能量指數話語的原因？如果不分析深層原因，不致力於解決造成負能量話語的社會問題，而一味刪除這類話語，那麼輿情分析的產業就成為規訓文明的一種技術手段。

第七，關於網絡文明的話語，常常直接與國家文化安全聯繫在一起。其結果是，以國家文化安全的壓倒性話語，遏制「負面」網絡輿情發展。如「共建網絡安全，共享網絡文明」之類的語言，屢屢見諸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端。網絡安全與國家安全，並不是新概念。2002年，「不銹鋼老鼠」劉荻就曾以發布威脅國家安全的帖子的罪名被捕(Zhou, 2006: 218)。但近年來網絡與國家安全的話語顯著加強。同時，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斯諾登事件和維基泄密事件，也給網絡安全話語賦予新的正當性。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2014中國大陸成立了由習近平親自任組長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並出台《網絡安全法》。這是國家機器支撐柔性文明治網的又一舉措。

最後一點，是官方媒體和政務微博、微信(雙微)在文明治網和網絡事件反動員中的作用。早期的官方媒體，在網絡上影響力較弱。但近年來，官方媒體活躍於新媒體平台，在網絡上貼近新媒體文化，使用網絡化語言，集聚了人氣，影響明顯擴大。如《人民日報》微博號粉絲數近5,000萬，新華網的微博粉絲1,700萬。官方媒體的微博公號及政務雙微在發生危機事件的情況下，一改從前的被動處境，往往主動地發布信息，爭取輿論主動權，側重傳達「正能量」和正面情感，並對網民的負面情感以文明和理性的名義，予以消解。

以上八種規訓技術，構成文明治網的基本手段。下面用兩個案例來說明，這些規訓技術如何被用來對網絡事件進行情感反動員(demobilization)。

案例一：2013年「夏俊峰案」

關於夏俊峰案中對網絡悲情和同情的消解，主要以理性的面貌出現。這裏借用宋志標的博文「維穩戰士與理中客」的一段話對事件的背景做一交代。宋文這樣開頭：

瀋陽城管死亡的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後，遺孀張晶在亡人「頭七」為其出殯。這一天正好是十一，一個家庭的祭日與執政黨的節日如此巧合，從而將同情夏家的聲音呈隱喻性地放大。然而，同情之輿論已經抵達頂峰，一場「求真」的質疑聲浪隨後掩殺而來。(宋志標，2013年10月11日)

宋文準確地把握了兩股網上力量交鋒的表現形式是對情感的態度：以夏俊峰遺孀張晶為代表的一方，以悲情、同情、溫情的情感，帶動了網上針對司法和城管等部門執法弊端的抗爭怨恨聲音。幾年之前，在類似的事件中，悲情和憤怒這樣的「負面」情感會佔有壓倒優勢，不會受到很多質疑。如2009年的鄧玉嬌事件。而2013年大陸的網絡輿論場已經在發生變化。

宋文區分了攻擊張晶的兩種人，一種人是職業網評員，另一種是理中客，指出「在夏案輿論大逆轉中，理中客扮演了重要作用。」上文提到的《法制晚報》關於理中客的文章，也用夏俊峰的案例來說明理中客雖然有影響，但卻「不招人待見」：

瀋陽街頭小販夏俊峰砍殺城管案件，雖然是「殺人犯」，但社會的一些輿論卻能站在夏俊峰一邊，就應該好好反思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官方大力推崇和武裝的城管總是被人民群眾唾罵？為什麼影響市容市貌的遊販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諒解？可「理中客」根本不去想這些問題，卻一味指責社會輿論偏激、不理性。（張瓊，2013年11月4日）

在夏俊峰案例中，主流媒體的聲音也以消解網絡情感為主。例如「央視網評」2013年10月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夏俊峰案再反思：我們不該淪為烏合之眾〉。題目把網民比作烏合之眾，並對網絡上的情感表達予以直接批判：

對那些過於煽情的言辭，或者狂熱的情節，網友們不妨降低三分參與的衝動，冷靜一些，理性一些，而不是跟著別人義憤填膺，或者架秧子起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同情弱者，是很正常的情感，但誰也不能通過誇大或造假來消費人們的同情。這種消費，是不道德的，潛伏著嚴重的危機，一旦被戳破，將使事情出現逆轉，激化人們的逆反心理。（楊平之，2013年10月8日）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後觸發的網絡事件中，進行情感反動員的，有官方媒體，有匿名網評員，也有其他支持政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聲音的網民尤其是所謂的「理中客」。這些反動員的聲音，均以文明和理性的面貌出現。一方面，他們指責張晶在微博中把另一個殺城管的小販崔英杰的落淚照，當作夏俊峰的照片轉發，批評張晶的意圖是故意用一張落淚照博取網民的同情。另一個策略是轉移網上話題，不談夏俊峰的死刑，轉而攻擊張晶和夏俊峰的人品，說他們的兒子抄襲別人的畫作等等。最終，雖然針對夏俊峰事件的網絡輿情頗多同情，但還是受到反情感動員聲音的消解，未能形成有影響的網絡事件。

案例二：2015年「東方之星」長江沉船事件

「東方之星」長江沉船事件，被大陸官方認作是抑制網絡事件的成功案例。與2011年的溫州動車事件相比，兩次事件後的網民反應區別很明顯。沉船事件之所以沒有演變成動車事件中的網絡情感動員，與官方的反動員有直接關係。

2015年6月1日21時28分，一艘從南京駛往重慶的「東方之星」號客輪在湖北監利水域傾覆。船上包括遊客、船員共454人，僅12人獲救。根據新浪政務傳媒學院的分析報告，事故發生後的幾天，微博、微信的輿論，正面情緒一直高於負面情緒：

每日情感輿論演變圖可見，正面情緒一直高於負面情緒，2日、3日是事件的發酵期與爆發期，正負面情緒非常接近，4日、5日隨著事件的平緩，正面情緒遠大於負面情緒。演變圖說明，在事件的發酵期與爆發期，是正負面情緒的較量期，也是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發揮作用的關鍵時期。政府和相關部門利用微博積極發布消息，跟進救援，可以極大程度上平息輿論中的負面情緒。（新浪政務新媒體學院，2015年6月12日）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的2015年6月份輿情監測報告稱，「東方之星」沉船事故，是突發性災難，本來有可能形成輿論危機。之所以輿論危機沒有發生，是因為政府行動快，各級政務新媒體發揮了傳播力：

一是官方於24小時內公布全部乘客名單，各地媒體廣泛轉

載，二是媒體傳播內容上更偏重於救援現場，如辛勤的「蛙人」救援的細節，而非以往「領導關心、救援及時」等空洞蒼白的描述，三是各級政務雙微及時發送相關消息消除民眾疑惑，比如當時的氣象條件、三峽蓄水救人、逃生技巧等，在明晰救援這一傳播主線的基礎上，與傳統的紙媒和門戶網站形成了傳播合力。（人民網，2015年7月10日）

以往網絡事件的成功動員，往往會創造出新的網絡符號。如「正龍打虎」、「躲貓貓」、「范跑跑」、「我爸是李剛」，以及溫州動車事故後出現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雷蔚真、曹小杰，2009；雷蔚真，2011）。沉船事件沒有生產出類似的網絡符號，亦可歸因於文明淨網行動比從前更加有效。

不過，新浪的報告也表明，雖然正面情緒超過「負面」情緒，但「負面」情緒仍然存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官方媒體一方面以理性和文明話語消解網絡的情感動員，一邊卻也訴諸自身的情感動員，通過政務微博和官方媒體微博，製造出大量正面情緒的話語，結果反而受到網民的調侃和批評。如新浪微博上有人列出官方媒體的「十大噁心標題」，被大量轉發。其中《人民日報》的〈救援一線，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據李吉呵德的博客稱，「因其娛樂與弱智被人罵慘，列為『十大噁心標題』榜眼。」（李吉呵德，2015年6月10日）而從知乎上的一個頻頻被刪的熱門話題〈如何評價「長江沉船事故」的民眾輿論導向？〉，也可看出網民對官媒的正面情緒表達的質疑。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整理和保留的帖子，說明網民大量質疑網上官媒的煽情。知乎上的原文如下：

在事故發生的次日下午便出現了大量的類似救援人員辛苦，祖國偉大，非常感動之類的言論，與以往事故發生時首先出現的質疑，問責的相比一反常態，甚至對救援者表達感動的聲音蓋過了對遇難者和其家屬惋惜的聲音。只要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便遭到圍攻並扣以鍵盤俠的帽子。這意味著網絡輿論開始逐漸偏向於支持政府，理性和明智，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中國數字時代用谷歌緩存所保留下來的419條答覆中，大多是批評和質疑的聲音，如：

為什麼支持政府就是理性了？

哪個國家發生災難不會罵政府？中國，朝鮮，等等。

哪些國家會罵政府，美國，日本，英國，法國，韓國，等等。(中國數字時代，2015年6月6日)

從政府角度看，沉船事故發生後的幾天內，輿情管理較為成功，正面情緒大於負面情緒。但事態後來的發展表明，負面情緒有所增加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2015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微博發布中央電視台的消息稱「#長江客船沉沒#【經重新確認：「東方之星」客船翻沉時總人數454人 12人獲救】經過有關部門調查核實，最終確認「東方之星」客船上實有人員454名，其中遊客403人、船員46人、旅行社工作人員5人。經過逐一的身份甄別核實，獲救者人數由最初公布的14人確定為12人。(央視)」

該條微博後，跟帖之多、質疑聲之大，可謂形成了抗議性的網絡事件。網友大多質疑：何以救起來十幾個人，居然諾大的中央媒體就數不清楚人數，實在讓人費解。

該案例說明，「文明」話語的運作，如同國家機器其他零件的運作一樣，有其多面性和模糊性。也許大部分時間它運轉正常，但也難免有部件失靈的時候。也許在正常運轉一段時間之後，這部機器會發生老化、開始反應遲鈍，甚至出現故障。總之，不論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文明」話語，還是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話語，它們已經像機器那樣運轉起來，規制著互聯網上言論空間。但面對千變萬化的網絡空間，「文明」這部機器是否能夠長期有效地運轉下去，不僅要看機器本身的質量如何，還要取決於它的對象——廣大網民——的態度、耐力、膽量、機智、感情變化等多種因素。

網絡事件向新媒體事件的結構轉型

大陸網絡管制一直甚為嚴厲，但對網絡事件的生成並未產生明顯

的消解作用。為什麼2013年以來的舉措，會產生不同以往的效果？本文分析認為，這與網絡治理新舉措的內容及其實施的社會環境有關。之前網絡管制的手段，以被動的阻塞、屏蔽或壓制為主。刪帖由網絡公司具體執行，公安、宣傳和網絡監管部門監督，網絡管制在越維穩越不穩的維穩體制下實施(Xie, 2013)。2013年以來的網絡管制，策略上有明顯調整。新的策略，借用官方的話語，是剛柔並濟。其中「文明淨網」、促進「網絡文明傳播」的意識形態話語和以「文明」為核心的「社會規訓技術」，佔有突出地位。文明淨網的核心，是從多方面抑制「負面」網絡情緒的表達，從而減少抗爭性網絡事件發生的頻率。

網絡事件，本來是指抗爭性的事件。但在文明淨網的環境下，事件的抗爭性質有所減弱，傳播「正能量」的事件增加。其結果是抗爭性的網絡事件被共識性(consensus)的新媒體事件所取代。²表一列舉了兩種事件的主要區別。

表一 抗爭性網絡事件與共識性新媒體事件的比較

抗爭性網絡事件	共識性新媒體事件
1. 主要情感：悲情、憤怒、戲謔、義憤、懷疑	1. 主要情感：驕傲、自豪、喜悅、忠誠
2. 違背或挑戰主旋律	2. 符合主旋律和主流意識形態
3. 參與者為一般意義上的「網民」	3. 參與者分化為：「網民」、五毛、自乾五、政務微博、官方媒體等等
4. 缺少政治合法性	4. 具備政治合法性
例：2011年溫州動車事件，2012年楊達才「表哥」事件	例：帝吧出征：「我深深的愛著這個國家」微話題

這個變化是一種哈貝馬斯式的結構轉型。不同的是，在哈貝馬斯分析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資本市場，而在網絡事件向新媒體事件轉型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國家。需要強調的是，國家雖然起主導作用，但並不是唯一的行動主體。一方面，國家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明治網。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社會力量對國家的行為做出積極響應，支持政府的治理行為。

2013年以來的網絡治理，有其特定的社會和歷史環境。2013年是習李新政的第一年。「中國夢」的話語成為核心話語，網上網下瀰漫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情緒(這種情緒到2016年1月份的「帝吧出征」事件達到一個高潮)。同時，反腐倡廉的政治運動，以前所未有的態勢，扳倒大批高官。中國夢與反腐，形成正反兩面的社會輿論衝擊波，給同時開展的打擊網絡傳謠和整治大V等文明治網行動，提供了硬的威懾力量和柔的社會氣氛。國際上，2013年6月，前美國中情局雇員斯諾登揭露出來的美國政府「棱鏡門」事件，不僅使網絡信息安全成為重要的國際話題，更為大陸政府的治網行動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話語，從而使網絡安全、國際安全、文化安全成為網絡文明話語的盾牌。

以文明的名義，消解和阻塞網絡的「負面」情感，同時擴大正能量的生產和傳播，這不僅僅是網絡治理的新思路。鑒於網絡傳播(包括手機)日益成為當代生活、文化、經濟的核心內容，那麼對於網絡傳播進行情感治理，也就是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情感治理。網絡情緒的管理，因此成為社會情緒管理的切入口(關於社會管理，見Lee & Zhang, 2013; Picke, 2012)。

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前景如何，尚難以判斷。本文所描述的結構轉型，是一個仍然在發展的過程。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話語，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網絡是一個多元互動的新技術空間，網絡空間的表達，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文明的進程」也是一個充滿變數的過程。

最後應該指出，本文旨在闡述文明的話語如何成為國家治理術，對網上的文明行為本身毫無詬病之意。不文明的網絡空間，對公共表達和交流有害無益。但這並不意味著達到某種「文明」程度的網絡空間，就真正有益於公民的表達與交流。以文明的名義消解網絡的「負面」情感，同時迴避情感表達背後深層的社會原因，那麼「文明」的規訓技術就沒有能夠觸及到網絡事件情感動員的真正邏輯，因此就未必能夠從根本上消解網絡事件。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文明與情感並不是矛盾的兩個對立面。中國文化向來講情理交融。心是情之所，也是理之寓。古訓「詩言志」中的志，亦情亦理。網民遭遇觸及道德底線的社會不公的時候所表達的怨與憤，恰恰是正義感的表達。³這樣的公眾表達，正是現代公民社會中文明和理性的表現。

註釋

- 1 本文將抗爭性的「網絡事件」與共識性的「新媒體事件」相區別，旨在突出轉型前後的變化。這裏所謂「共識性」(consensus)，借用了社會運動理論中的「共識性運動」(consensus movements)的概念。有學者認為，共識性運動不能夠推動社會變遷 (McCarthy & Wolfson, 1992)。
- 2 邱林川、陳韜文(2011)所區分的四種新媒體事件(民族主義事件、權益抗爭事件、道德隱私事件、公權濫用事件)，基本都具有抗爭特徵。
- 3 關於文明與正義的關係問題，參見Calabrese (201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卞清、高波(2012)。〈從「圍觀」到「行動」：情感驅策、微博互動與理性複歸〉。《新聞與傳播研究》，第6期，頁10-17。
- Bian Qing, Gao Bo (2012). Cong weiguan dao xingdong: Qinggan quce, Weibo hudong yu lixing fugu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6, 10-17.
- 曹龍虎(2014)。〈國家治理中的「路徑依賴」與「範式轉換」：運動式治理再認識〉。《學海》，第3期，頁81-87。
- Cao Longhu (2014). Guojia zhili zhong de "lujing yilai" yu "fanshi zhuanhuan": yundong shi zhili zai renshi. *Xuehai*, 3, 81-87.
- 鄧小平(1994)。《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Deng Xiaoping (1994). *Deng Xiaoping wenxuan*, 2.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范承剛、周華蕾、劉志毅、張瑞(2013年9月12日)。〈大V近黃昏？〉。《南方周末》。取自 <http://www.infzm.com/content/94222>。
- Fan Chenggang, Zhou Hualei, Liu Zhiyi, Zhang Rui (2013, September 12). Da V jin huanghun? *Nanfang zhoumo*.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fzm.com/content/94222>.
- 高華(2000)。《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Gao Hua (2000). *Hong taiyang shi zenyang shengqi de: Yan'an zhengfeng yundong de lailongqumai*.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郭小安(2013)。〈網絡抗爭中謠言的情感動員：策略與劇目〉。《國際新聞界》，第12期，頁56-6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Guo Xiao'an (2013). Wangluo kangzhengzhong yaoyan de qinggan dongyuan: Celve yu jumu. *Guoji xinwenjie*, 12, 56–69.
- 江澤民(2006)。《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Jiang Zemin (2006). *Jiang Zemin wenxuan*, 3.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焦德武(2014)。〈微博輿論中公眾情緒形成與傳播框架分析：以「臨武瓜農之死」為例〉。《江淮論壇》，第5期，頁25–31。
- Jiao Dewu (2014). Weibo yulunzhong gongzhong qingxu xingcheng yu chuanbo kuangjia fenxi: Yi linwu guanong zhisi weili. *Jianghuan luntan*, 5, 25–31.
- 雷蔚真、曹小杰(2009)。〈從生髮過程看網絡語符的本質〉。《國際新聞界》，第12期，頁87–93。
- Lei Weizhen, Cao Xiaojie (2009). Cong shengfa guocheng kan wangluo yufu de benzhi. *Guoji xinwenjie*, 12, 87–93.
- 雷蔚真(2011)。〈從「儀式」到「派對」：互聯網對「媒介事件」的重構〉。邱林川、陳韜文主編，《新媒體事件研究》(頁66–9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Lei Weizhen (2011). Cong yishi dao paidui: Hulianwang dui meijie shijian de chonggou. In Qiu Linchuan, Chen Taowen (Eds.), *Xinmeiti shijian yanjiu* (pp. 66–96).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李吉呵德(2015年6月10日)。〈亮點自尋〉。取自 <http://lijihede1794.blogchina.com/2541309.html>。
- Li Ji Kede (2015, June 10). Liangdian zixun. Retrieved from <http://lijihede1794.blogchina.com/2541309.html>.
- 劉濤(2016)。〈情感抗爭：表演式抗爭的情感框架與道德語法〉。《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5期，頁102–113。
- Liu Tao (2016). Qinggan kangzheng: biaooyanshi kangzheng de qinggan kuangjia yu daode yufa. *Wuhan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 5, 102–113.
- 《人民日報》微博公號(2016年1月22日)。〈帝吧出征FB，友邦有話要說〉。取自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xNDM4MA==&mid=414189337&idx=1&sn=9bd322d52ca520d47899cda357df1ec4&scene=0#wechat_redirect。
- Renmin ribao Weibo gonghao (2016, January 22). Diba chuzheng FB, youbang youhua yaoshuo. Retrieved fro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xNDM4MA==&mid=414189337&idx=1&sn=9bd322d52ca520d47899cda357df1ec4&scene=0#wechat_redirect.
- 人民網(2014年3月18日)。〈2013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取自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318/c364391-24662668.html>。

- Renminwang (2014, March 18). 2013nian zhongguo hulianwang yuqing fenxi baogao. Retrieved from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318/c364391-24662668.html>.
- 人民網 (2015年7月10日)。〈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6月網絡輿論共識度報告〉。取自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5/0710/c210107-27283825.html>。
- Renminwang (2015, July 10). Renminwang yuqing jianceshi fabu 6yue wangluo yulun gongshidu baogao. Retrieved from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5/0710/c210107-27283825.html>.
- 上海交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 (2015)。〈2014年中國網絡輿情研究報告〉。《新聞記者》，第2期，頁21–28。
-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yuqing yanjiu shiyanshi (2015). 2014nian zhongguo wangluo yuqing yanjiu baogao. *Xinwen jizhe*, 2, 21–28.
- 宋志標 (2013年10月11日)。〈維穩戰士與理中客〉。取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3/10/%e5%ae%8b%e5%bf%97%e6%a0%87-%e7%bb%b4%e7%a8%b3%e6%88%98%e5%a3%ab%e4%b8%8e%e7%90%86%e4%b8%ad%e5%ae%a2/>。
- Song Zhibiao (2013, October 11). Weiwen zhanshi yu lizhongke. Retrieved from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3/10/%e5%ae%8b%e5%bf%97%e6%a0%87-%e7%bb%b4%e7%a8%b3%e6%88%98%e5%a3%ab%e4%b8%8e%e7%90%86%e4%b8%ad%e5%ae%a2/>.
- 隋岩、苗偉山 (2014)。〈中國網絡群體事件的主要特徵和研究框架〉。《現代傳播》，第11期，頁26–34。
- Sui Yan, Miao Weishan (2014). Zhongguo wangluo qunti shijian de zhuyao tezheng he yanjiu kuangjia. *Xiandai chuanbo*, 11, 26–34.
- 騰訊網 (2015年6月4日)。〈中央統戰部解讀何謂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2016年3月14日取自 <http://news.qq.com/a/20150604/046561.htm>。
- Tengxunwang (2015, June 4). Zhongyang tongzhanbu jiedu hewei xinmeitizhong de daibiaoxing renshi. Retrieved on March 14, 2016 from <http://news.qq.com/a/20150604/046561.htm>.
- 團中央關於廣泛組建網絡文明志願者隊伍的通知 (附各省名額分配表) (2015年4月4日)。取自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4/%e5%9b%a2%e4%b8%ad%e5%a4%ae%e5%85%b3%e4%ba%8e%e5%b9%bf%e6%b3%9b%e7%bb%84%e5%bb%ba%e7%bd%91%e7%bb%9c%e6%96%87%e6%98%8e%e5%bf%97%e6%84%bf%e8%80%85%e9%98%9f%e4%bc%8d%e7%9a%84%e9%80%9a%e7%9f%a5%ef%bc%8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Tuanzhongyang guanyu guangfan zujian wangluo wenming zhiyuanzhe duiwu de tongzhi (fu gesheng ming'e fenpeibiao) (2015, April 4). Retrieved from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4/%e5%9b%a2%e4%b8%ad%e5%a4%ae%e5%85%b3%e4%ba%8e%e5%b9%bf%e6%b3%9b%e7%bb%84%e5%bb%ba%e7%bd%91%e7%bb%9c%e6%96%87%e6%98%8e%e5%bf%97%e6%84%bf%e8%80%85%e9%98%9f%e4%bc%8d%e7%9a%84%e9%80%9a%e7%9f%a5%ef%bc%88/>.

王謙秋 (2013)。〈從周久耕到楊達才：人肉搜索事件中的抗爭性話語研究〉。《中國傳媒報告》，第2期。

Wang Qianqiu (2013). Cong Zhou Jiugeng dao Yang Dacai: Renrou sousuo shijianzhong de kangzhengxing huayu yanjiu. *Zhongguo chuanmei baogao*, 2.

吳世文 (2014)。〈轉向新媒體事件研究：理論命名、研究視域與理論問題〉。《現代傳播》，第4期，頁132-136。

Wu Shiwen (2014). Zhuanxiang xinmeiti shijian yanjiu: Lilun mingming, yanjiu shiyu yu lilun wenti. *Xiandai chuanbo*, 4, 132-136.

謝金林 (2012)。〈情感與網絡抗爭動員：基於湖北「石首事件」的個案分析〉。《公共管理學報》，第9卷第1期，頁80-93。

Xie Jinlin (2012). Qinggan yu wangluo kangzheng dongyuan: Jiyu Hubei Shishou shijian de ge'an fenxi. *Gonggong guanli xuebao*, 9(1), 80-93.

新浪政務新媒體學院 (2015年6月12日)。〈長江沉船事件雙微傳播分析〉。取自 http://weibo.com/p/1001593852968049936985?pid=PI_Official_CardMixFeedv6__4&feed_filter=2。

Xinlang zhengwu xinmeiti xueyuan (2015, June 12). Changjiang chenchuan shijian shuangwei chuanbo fenxi. Retrieved from http://weibo.com/p/1001593852968049936985?pid=PI_Official_CardMixFeedv6__4&feed_filter=2.

楊國斌 (2009)。〈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39-66。

Yang Guobin (2009). Beiqing yu xixue: Wangluo shijianzhong de qinggan dongyu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39-66.

楊國斌 (2013)。《連線力：中國網民在行動》，鄧燕華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Yang Guobin (2013). *Lianxianli: Zhongguo wangmin zai xingdong*, Deng Yanhua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楊平之(2013年10月8日)。*〈夏俊峰案再反思：我們不該淪為烏合之眾〉*。
2016年3月14日取自<http://opinion.cntv.cn/2013/10/08/ARTI1381226140674753.shtml>。

Yang Pingzhi (2013, Oct 8). Xia Junfeng an zai fansi: Women bugai lunwei wuhezhihong. Retrieved on March 14, 2016 from <http://opinion.cntv.cn/2013/10/08/ARTI1381226140674753.shtml>.

宜興市文明辦(2015)。*〈關於開展「文明網站」評選活動的通知〉*。2015年10月23日取自<http://www.yixing.gov.cn/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444767>。

Yixingshi wenmingban (2015). Guanyu kaizhan wenming wangzhan pingxuan huodong de tongzhi. Retrieved on October 23, 2015 from <http://www.yixing.gov.cn/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444767>.

袁光鋒(2016)。*〈「情」為何物？反思公共領域研究的理性範式〉*。《國際新聞界》，第9期，頁104–118。

Yuan Guangfeng (2016). Qing wei hewu? Fansi gonggong lingyu yanjiu de lingxing fanshi. *Guoji xinwenjie*, 9, 104–118.

張瓊(2013年11月4日)。*〈「理中客」為什麼不招人待見？〉*《法制晚報》。2016年3月14日取自<http://www.fawan.com/Article/ztbd/2013/11/04/160502216564.html>。

Zhang Qiong (2013, November 4). Lizhongke weishenme bu zhaoren daijian? *Fazhi wanbao*. Retrieved on March 14, 2016 from <http://www.fawan.com/Article/ztbd/2013/11/04/160502216564.html>.

中國數字時代(2015年6月6日)。*〈如何評價《如何評價《如何評價「長江沉船事故」的輿論導向》這一問題被刪？》這一問題被刪？〉*。2016年3月14日取自<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6/%e5%a6%82%e4%bd%95%e8%af%84%e4%bb%b7%e5%a6%82%e4%bd%95%e8%af%84%e4%bb%b7%e9%95%bf%e6%b1%9f%e6%b2%89%e8%88%b9%e4%ba%8b%e6%95%85%e7%9a%84%e8%88%86%e8%ae%ba%e5%af%bc%e5%90%91/>。

Zhongguo shuzi shidai (2015, June 6). Ruhe pingjia “ruhe pingjia ‘ruhe pingjia Changjiang chenchuan shigu de yulun daoxiang’ zheyi wenti beishan?” zheyi wenti beishan? Retrieved on March 14, 2016 from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6/%e5%a6%82%e4%bd%95%e8%af%84%e4%bb%b7%e5%a6%82%e4%bd%95%e8%af%84%e4%bb%b7%e9%95%bf%e6%b1%9f%e6%b2%89%e8%88%b9%e4%ba%8b%e6%95%85%e7%9a%84%e8%88%86%e8%ae%ba%e5%af%bc%e5%90%91/>.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40 期 (2017)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nagnost, A. (1997).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akken, B. (2000). *The exemplary society: Human improvement, social control, and the dangers of modernity in China*. London: Clarendon Press.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nn, M. (2015). Reimagining repression: New censorship theory and after. *History and Theory*, 54, 25–44.
- CAC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2015, August 21). “2015 nian zhongguo hao wangmin” wangluo zuopin zhengji pingxuan huodong zai jiangxi qidong. <http://news.jxntv.cn/opinion/20150821/107305.shtml>. Accessed October 23, 2015.
- Calabrese, A. (2015). Liberalism’s disease: Civility above jus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5), 539–553.
- Cell, C. P. (1977).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Cheek, T. (2016).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T. (2015).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Censorship and the Internet novel Such Is This World.” In G. Yang (Ed.), *China’s contested Internet* (pp. 19–43). Copenhagen: NIAS Press.
- Deng, Y., & O’Brien, K. J. (2013).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533–552.
- Duara, P. (2001). The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and pan-Asianis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1), 99–130.
- Dynon, N. (2008). “Four civiliz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ost-Mao Chinese socialist ideology. *The China Journal*, 60, 83–109.
- Elias, N. (1939/2000).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 Festa, P. E. (2006). Mahjong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ivility, Chineseness, and mass cultur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4(1), 7–35.
- Foucault, M. (199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L. Martin, H. Gutman, and P. H. Hutton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pp. 16–49).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Friedman, S. L. (2004). Embodying civility: Civilizing processes and symbolic citizenship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3), 687–718.
- Gong, G. W. (1984).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D. (2010). Policing and racial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ese c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3(4), 593–610.

- Han, R. (2015). 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 China's "voluntary fifty-cent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224, 1006–1025.
- Hardt, H. (2000). Communication is freedom: Karl Marx on press freedom and censorship. *Javnost—The Public*, 7(4), 85–99.
- Herbst, S. (2010). *Rude democracy: Civility and inciv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02), 326–343.
- Kipnis, A. (2006). Suzhi: A keyword approach. *The China Quarterly*, 186, 295–313.
- Lee, C. K., & Zhang, Y.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6), 1475–1508.
- Litzinger, R. A. (2000).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Liu, L.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Kinnon, R. (2008). Flatter world and thicker walls? Blogs, censorship and civic discourse in China. *Public Choice*, 134(1–2), 31–46.
- McCarthy, J. & Wolfson, M. (1992). Consensus movements, conflict movements, and the cooptation of civic and state infrastructures. In A. Morris and C.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pp. 273–29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üller, B. (2004). Censorship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Mapping the territory. In B. Müller (Ed.), *Censorship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in the modern age* (pp. 1–32). Amsterdam: Rodopi B. V.
- Otis, E. M. (2011). *Markets and bodies: Women, service work,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 J. (2002).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7(2), 111–128.
- Perry, E. J. (2011). From mass campaigns to managed campaigns: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S. Heilmann and E.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pp. 30–6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 J. (2013).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orienting" party propagand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Retrieved on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28945028.pdf>.
- Pieke, F. N. (2012).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6, 149–165.
- Scott, J. C. (1999).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zablewicz, M. (2014) The "losers" of China's Internet: Memes as "structures of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feeling” for disillusioned young netizens. *China Information*, 28(2), 263–279.
- Taneja, H. & Wu, A. X. (2014). Does the great firewall really isolate the Chinese? Integrating access blockage with cultural factors to explain web user behavi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0(5), 297–309.
- Tang, L., & Yang, P. (2011). Symbolic power and the internet: The power of a “hors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5), 675–691.
- Thornton, P. M. (2007). *Disciplining the state: Virtue, violence, and state-making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Tomba, L. (2014).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sui, L. (2003). The panopticon as antithesis of a space of freedom: Control and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17(2), 65–82.
- Xie, Y. (2013). Rising central spending on public security and the dilemma facing grassroots officials in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2(2), 79–109.
- Yang, F. (2014). Rethinking China’s internet censorship: The practice of reco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New Media & Society*, 18(7), 1364–1381.
- Zhou, Y. M. (2006).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楊國斌 (2017)。〈情之殤：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0期，頁75–104。